

南蠻通辭於日葡貿易中的貢獻

傳教士陸若漢成為德川家康貿易代理人始末考

劉小珊*

16世紀的日本長崎作為國際商業城市極為繁榮，時常有從澳門滿載着中國絲綢的大船進入港口。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曾一度被指定為德川家康的貿易代理人，這在當時是一件值得耶穌會自豪的非同尋常之事。鑒於遠東國際貿易與商業航線的特定情況，貿易代理人肩負特殊的使命。陸若漢不僅是生絲等大宗貨物的中間人，還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並操縱着一系列的商業活動。在這種特殊的情境中，陸若漢的行為舉止不僅在日本教區最具影響力，並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教會在日本生存的可能。置身日本教會當時所處的特殊環境，陸若漢的這一不同尋常的新職務顯然會被視為意義重大而深遠。此舉亦表明，日本統治者德川家康十分重視耶穌會與葡萄牙商人的特殊關係，並試圖利用這種便利為自己謀取實際利益。

日本慶長三年（1598），德川家康成為日本新的統治者。一方面，耶穌會士期待着日本一直受官方迫害的傳教形勢從此得以轉變；另一方面，為使日本天主教紮實穩健地發展，增加財政收入，耶穌會士繼續促進葡萄牙商船的來航，並直接參與生絲貿易。各地大名、領主為得到武器彈藥、生絲、絲織品和黃金，以及徵收入港稅，努力將葡萄牙商船招至自己的領地。豐臣秀吉推行的外征，在政治和外交上沒有收到任何效果就宣告結束，但他對於通商貿易的發展一直非常熱心，這一意圖被接管政權的德川家康全盤繼承下來。⁽¹⁾德川出於對外貿易的考慮，對天主教傳教採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一段時期內，耶穌會的傳教事業似乎重見天日，傳教士們的身份變得明朗起來。此間，南蠻通辭陸若漢也被德川家康賦予新的重要使命。

受德川委託參與長崎的貿易和行政管理

陸若漢初識德川家康是在1593年的夏天。當時有傳言說，葡萄牙商人因前年耶穌會的建築物被長崎奉行寺澤廣高帶兵毫無道理地拆毀一事耿耿於懷，這一年大概不會再來日本。寺澤雖然是奉命破

壞耶穌會建築，但仍在擔心自己會因為葡萄牙商船不來做生意而被豐臣秀吉轉嫁責任，甚至會遭到革職的厄運。此時豐臣秀吉的確十分擔心葡萄牙貿易的未來，為此經常召見陸若漢，詢問有關葡萄牙商船的近況。陸若漢比較清楚澳門當時不景氣的狀況，不時寬慰豐臣秀吉要耐心等待，他相信葡商船一定會再來日本做生意。終於在1593年的這個夏天，葡萄牙加斯帕爾船駛入長崎港，豐臣秀吉、寺澤和耶穌會士們總算放下心來。庫帕稱：

加斯帕爾船依照慣例給秀吉和其他官員送上了豪華的禮品，並由身穿紅衣服拿着金槍的黑人合着樂器的伴奏盡情跳舞表演助興，心情舒暢的秀吉命人賜給每個人白絲綢衣服作為慰勞品。⁽²⁾

這一年夏天，有五、六個代表團來名古屋作禮節性拜訪，其中有明朝的兩個使節率領的一百五十人的使節團。中國使節團受到熱烈歡迎與豐臣秀吉親切會見。菲律賓使節團的第二批人員也接踵來到名古屋拜訪，此次的團長是西班牙方濟各會士布拉斯凱斯（Fray Pedro Baptista Blázquez）。菲律賓使

*劉小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語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日本史、中日交通史、日本漢學方面的研究。

節團在名古屋逗留期間，陸若漢偷偷地穿着和服拜訪了這些身穿修道服的人。布拉斯凱斯從菲律賓總督那裡帶來給豐臣秀吉的兩封親筆信，跟該使節團交涉的日方代表前田玄以奉行，因為根本不懂西班牙文，便將書信送至陸若漢處請他翻譯。

陸若漢不僅把前田、寺澤當作朋友，平日裡與之交往甚密，還從保護天主教的立場出發，通過二人的幫助，積極活動當時逗留在名古屋的日本政界要人，並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其中重要人物之一，就是僅次於豐臣秀吉的實權人物德川家康。德川好像早就聽說過這個日語流利、年輕有為的葡萄牙人“通辭”，很快便邀請他到自己家中相聚。在德川家，陸若漢受到極為熱情的接待和無微不至的照顧。德川還特意請來兩名負責跟中國通信的佛教僧侶與陸若漢一塊兒討論有關宇宙、世間、宗教的事物。陸若漢用坦然自信的態度向德川以及兩位僧侶介紹了天主教思想，說明造物主和造物是不同的，世間萬物均受神的旨意所支配。這番言論無疑與佛教僧人們的信仰截然相反，儘管他們從內心在極力抵觸陸若漢闡述的天主教思想，但兩位僧侶並未當場進行反駁，祇是冷靜地聆聽，也許是出於在德川家必需的禮貌，或許也因為一時找不出合適的言詞來反駁這位滔滔不絕、能言善辯的對手。

德川家康聽完陸若漢的一番陳辭，倒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幾個人又從神學談到宇宙論，德川問世界到底是一個還是有很多呢？陸若漢回答說，世界祇有一個，並講述其中道理；還談起由於世界航海技術進步而發現的很多事物。像以前跟豐臣秀吉初次交往一樣，陸若漢給德川家康等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博學善交際，這些在後來耶穌會的私人信件中亦得到強調。⁽³⁾在名古屋逗留期間，陸若漢不僅在外交方面，而且在傳教事務方面也很忙。曾極受豐臣秀吉重視的高山右近介紹過一位身份高貴的人與陸若漢相見，據說此人對天文學很有興趣，於是陸若漢結合以前在府內神學院從神學、天文、地理等課程中學到的知識，跟此人大談一通日蝕、月蝕、春分、秋分，又講起開天闢地和靈魂永存等等天文地理神學理論，讓對方頻頻點頭，深感佩服，

竟然表示以後要好好學習，做一個天主教徒。後來德川家康再一次把陸若漢、戈斯梅修士請到家裡，向二人贈送絲綢襯衣，並告訴他們在1587年發出的驅逐令解除之前，允許他們兩位傳教士暫時呆在自己的領地內。

當時日本的長崎港乃至全國都在模倣西方風情，追隨歐洲流行服飾。為迎接西方使節團，官員們至少要備有一件歐洲式樣的衣服。在上流社會，有的人甚至還穿着一整套西衣服飾——披風、披肩，有褶皺領的襯衣、短褲，帶着西洋帽子。不僅西衣服裝，西餐也大為流行，以前被人嫌棄的牛仔肉，也越來越受人歡迎。有的人甚至並非天主教徒，也在脖子掛上一串珠子，嘴上唸叨着“上帝呀”、“瑪麗亞”甚麼的。⁽⁴⁾這種不自然的現象，很像後來明治時代曇花一現的模倣西洋熱。從這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是人世間常有的事情。當時盲目崇拜西方的過激現象很快就讓日本當權者無法忍受，最終天主教信仰遭到禁止也是歷史的必然。

陸若漢直接參與長崎的市政、貿易管理開始於1603年1月。德川家康曾告訴前來伏見城堡恭賀新年的陸若漢、長崎實力派商人村山等安，欲委任村山及當地有實力的四名天主教信徒一起掌管長崎的事務，以取代豐臣秀吉任命的長崎奉行寺澤廣高，並邀請陸若漢一同參與長崎港的行政事務管理。德川家康要求幾位管理者遇到重大問題必須找陸若漢和教會準管區長巴範濟商量；並劃出各自的分管範圍：高木、高島、町田、後藤四名長者負責管理長崎原有的舊城區，村山等安則負責後在舊城區週圍發展起來的新區域。如此安排，長崎實際上作為天主教影響的城市已得到德川家康這位新統治者的公開承認。⁽⁵⁾

1604年，德川家康派遣舊臣小笠原一庵前往長崎擔任奉行一職，專門管理長崎的貿易。另一方面，為解決日本商人和葡萄牙商人在生絲貿易上的糾紛，於同年5月頒佈“絲割符”制度⁽⁶⁾，給予葡萄牙商船在生絲交易上的某種限制。小笠原一庵在該制度的確立和執行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已被許多史料所證實。當然，長崎奉行的任務不僅限於葡萄牙商船的貿易業務，還行使對九州全區域

進行監督的權力，以及收集有關來自中國唐船的情報等職責，當然也負責長崎港的市政管理。小笠原一庵考慮到該城市管理的方便，於日本慶長十年（1605），將原大村氏所管轄的長崎新區域一部分，同幕府直接管轄的浦上土地作了交換。這次換地對大村十分不利，領主大村喜前固執地認定以陸若漢為代表的耶穌會與此次換地有重大關係，便開始向耶穌會發難。翌年，喜前甚至拋棄天主教信仰，轉入法華宗，還將耶穌會傳教士從大村領地內驅逐出去。此時，一直反對耶穌會成員參與長崎政事和貿易的主教塞爾凱拉和阿爾幹奇諾（Organtino Gneccchi），愈加顯得憂心忡忡。

同一年，陸若漢兩次從長崎上京造訪德川家康，得到德川贈與耶穌會的三百五十塔艾爾（中國銀幣單位兩——編者），另外，耶穌會還接受了白銀五千塔艾爾的貸款，長崎市也得到同等數額的貸款，因葡萄牙商船久未來港，耶穌會和長崎港均陷於經濟蕭條狀態。德川家康及其身邊的重臣都參與長崎通商貿易，此時的德川和當年豐臣一樣深切地感受到，“沒有耶穌會士的從中斡旋，葡萄牙貿易很難順利地進行”⁽⁷⁾。不可否認，由於陸若漢倍受德川家康的重用，耶穌會在長崎市政、長崎貿易中所佔據的地位愈發顯得重要，天主教會於日葡貿易所起到的作用更令日本統治者不能忽視。相反，德川家康一直以來巧妙利用日本耶穌會的作用和信用來管理長崎港，他在這方面的決策是明智而有效的。

成為德川家康的貿易代理人

陸若漢與日本新統治者及身居要職的諸多官員的交涉，表面上似乎不過一些平常交往，但在當時的歷史大背景下，對於中日葡貿易、天主教東傳、日本國內政治經濟形勢都產生了不同尋常的影響；而且能夠頻繁地拜會德川家康等要人並跟家康促膝談心，被時人認為是一件非常榮耀非同小可的事情。當時最高權力者德川家康被當作一尊神受人尊敬，被允許謁見家康的僅限於最有實力的重臣⁽⁸⁾，即使各地大名在拜見家康時也彷彿頂禮膜拜一般。這一點從1609年12月一位大名上京拜見家康⁽⁹⁾、

當時恰巧亦在場的比貝洛·伊·貝拉斯克（Vivero y Velasco）的記錄中可知一二：

有一個很有地位的大名來到會見廳。他的地位之高、權勢之大，從他所帶來的禮品就一目了然：金條、銀條，還有絲綢襯衣，以及其他各種物品，加起來大約超過兩萬杜卡多。禮品最初放在幾桌臺上，但皇帝（家康）連正眼都不看一下。這位大名在離家康殿下的寶座大約一百多步的地方趴下身來，頭垂得很低，幾乎要把臉貼到地板上了。沒有一個人跟這個大名說話，該大名從進入會見廳就沒敢抬起眼睛看皇帝的臉。不一會兒，他便帶着大批隨從人員默默退出會見廳。（……）據說他的隨從有三百人左右。⁽¹⁰⁾

“通辭”陸若漢竟然受到不同於他人的厚待，可見日本新君主對這位歐洲傳教士的欣賞和信任。在以後的中日葡貿易中，德川家康更是委託給他一項重任——指名陸若漢做自己的貿易代理人，並宣佈今後長崎的葡萄牙商人均須通過陸若漢來進行交易。⁽¹¹⁾在1607年的日本耶穌會士名單中，在陸若漢名字的旁邊有這樣一句簡短的說明：“羅德里格斯（陸若漢）神父從事官府的工作。”⁽¹²⁾

在協調耶穌會與日本新統治者和實力官員的關係，以及開展中日葡貿易的交涉中，陸若漢的外交手腕發揮得淋漓盡緻，一切均順利進行。但貿易代理人這種特殊的使命常常令他碰到許多不盡如人意的的事情，使他的處境逐漸艱難，其努力亦往往適得其反，甚至招致最終無法預料的結局。

據耶穌會的記錄，1601年夏末，陸若漢因故離開長崎去了京城。此時恰逢寺澤奉行接到家康命令，讓其派遣屬下官員前往長崎收購霍拉希奧·內賴特（Horatio Nerete）商船運來的中國絲綢。派去的官員雖得到指示必須通過陸若漢進行交易，卻自作主張隨意買來一批絲綢帶給德川家康交差。結果當該官員得知此絲綢的品質和價格都不如家康意時，為避免受到指責，便將責任推卸到陸若漢和耶穌會士身上，指責貿易代理人沒有盡到職責，由此重新引起家康對耶穌會士的不滿。倖好德川家康身

邊與陸若漢關係不錯的官員從旁為之辯解，說明陸若漢當時不在長崎，跟此次交易失敗毫無關係，才平息了家康的怒氣。⁽¹³⁾

九州方面發生了傳教士遭受打擊的事件——有一位深受耶穌會信賴的朋友（大村喜前）突然轉變友好態度加入迫害天主教徒的行列。遺憾的是陸若漢也被無辜捲進這一事件當中。事件緣於小笠原奉行的一個決定——出於行政管理的方便和維持法令秩序的必要，奉行提議將長崎附近的大村領地的一部分納入長崎的版圖，擴建成一個港口貿易城市。當時的長崎港在跟中國、葡萄牙等國家開展貿易中已逐漸繁榮，具備了一個大城市的規模。此決定同大村喜前領主欲在其領地內建立長崎開拓村、借此增加稅收的美夢相悖。大村領主基於陸若漢在京城官場中很有人緣，以及他作為貿易代理人的身份，便輕易得出判斷，該決定出自陸若漢的影響。於是，發出通告禁止大村的百姓出入天主教堂，從此斷絕跟傳教士交往。塞爾凱拉主教、小笠原奉行等人雖竭力澄清事實，仍無濟於事，大村領主仍執意要將耶穌會士全部從大村領地驅趕出去，並謊稱是德川家康的命令。事實上，陸若漢恰恰是主張撤銷擴建港口貿易這一決定的耶穌會士之一，他祇不過是“按照巴範濟神父的要求畫了一張給德川家康的長崎地圖”。⁽¹⁴⁾這莫名無端的誤會儘管最終得到化解，1607年2月15日大村喜前寫給巴範濟的信中⁽¹⁵⁾也承認自己驅逐傳教士是一個錯誤⁽¹⁶⁾，但畢竟陸若漢以及耶穌會傳教士們遭受到來自曾經的朋友的迫害，其精神傷害和由此產生的挫折感非同一般。

1609年，長崎港發生的葡萄牙船長安德列·佩索亞（André Pessoa）成功獲取朱印一事，更令陸若漢受到牽連。事情源於陸若漢曾經作為1609年7月29日從澳門駛來長崎的葡萄牙大型商船⁽¹⁷⁾的指揮官安德列·佩索亞的“通辭”，隨同他率領的該船代表團前往駿府拜訪過德川家康。⁽¹⁸⁾安德列·佩索亞雖說是第一次來日本，但在三年前，馬六甲被荷蘭人包圍時，他同日本人作過戰，並且在一年前，澳門發生日本船員和當地居民的衝突事件中，佩索亞指揮的軍隊跟日本士兵和船員有過一場激戰⁽¹⁹⁾，有

馬晴信大名手下的眾多日本船員死於佩索亞的鎮壓。雖然此事件並非因佩索亞而引發，事後也由日本方面出具材料表示日方船員應該承擔此次事件的全部責任，但有馬晴信大名仍對此事耿耿於懷，伺機報復。

安德列·佩索亞借來日本的機會，以前停泊澳門的有馬晴信部下和當地市民發生激烈衝突事件為由，向幕府統治者成功取得禁止日本人澳門航行的朱印——意味着日本商人從此不得前往澳門購買生絲，而葡萄牙商船獨佔貿易特權得到公認。⁽²⁰⁾這個決定遭到日本商人一致的強烈反對。另外，安德列·佩索亞對在澳門施淫威的日本暴徒的嚴厲處置一直令有馬晴信心存不滿，便借此機會，將佩索亞在澳門殺死多名日本人，此次獲取朱印意在控制日葡貿易特權等一一報知德川家康。接到有馬晴信上訴狀的德川家康頓時大怒，下令殺掉佩索亞，並聲稱要追究耶穌會和在長崎的葡萄牙人的責任。偏聽一面之辭的德川家康作出如此決斷，立刻使耶穌會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作為窮極之策，耶穌會副管區長帕奇奧建議把責任歸咎到陸若漢身上，因為他作為安德列·佩索亞的“通辭”，或許在佩索亞獲取朱印的事情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帕奇奧跟塞爾凱拉主教以及居住在長崎的耶穌會士們進行商議，結果大家被迫商定了一個統一的意見，即為了繼續傳教活動，陸若漢必須離開日本。大家認為如果陸若漢在此關鍵時刻離開，今後幾年中德川幕府以及長崎的官員大概不會再給耶穌會施加壓力了，其他耶穌會士們繼續留住日本將不成為問題。長崎奉行聽到這一決定非常得意，他答應自己在長崎和駿府方面會盡力為耶穌會幫忙。但是，帕奇奧心裡十分清楚，這樣的承諾經常是無法兌現的，後來幾年中發生的一連串事實也讓他終於明白：長崎奉行一開始就沒有和耶穌會合作的誠意。⁽²¹⁾

對此事的處理結果德川家康完全知曉，但他沒有出面保護自己的貿易代理人——那位一直為德川幕府獲取貿易利益盡心効力的葡萄牙青年傳教士。一切就這麼塵埃落定，那是發生在1610年3月的事情。⁽²²⁾雖然通過長崎貿易的圓滿進行，從中得到利益分配的耶穌會和德川家康都從陸若漢身上獲

得那麼大的恩惠，但由於他過份活躍，不僅宗教活動還因為他與世俗人士的接觸，引起耶穌會內部一些人的胡亂猜疑，以及某些不滿陸若漢深受重用的官員的刁難，再加上方濟各會傳教士的惡意誹謗。這樣一種氣氛，已使陸若漢無法在日本立足，也是造成他在此事件中被追究並承擔全部責任的原因之一。土井忠生在〈吉利支丹論考〉中稱：

老早就對按照陸若漢的意思進行貿易心懷不滿的長崎代理長官村山等安一直暗地裡聯絡長谷川藤廣企圖將陸若漢驅逐到國外。⁽²³⁾

陸若漢被任命為日本統治者德川家康的貿易代理人，在當時是一件值得耶穌會自豪的好事。但從事後的結局來看，一個歐洲人，且身為一名傳教士，在長崎擔任這樣一個微妙的職位，卻是一切災難的根源。鑒於遠東國際貿易與商業航線的特定情況，貿易代理人肩負特殊的使命：他不僅是生絲等大宗貨物交易的中間人，參與商品定價、交易等更為具體的交易過程，並充分運用他與耶穌會以及幕府將軍、長崎地方當局的特殊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並操縱着一系列的商業活動，力爭使各方從中漁利。在這種特殊的情境中，陸若漢不僅因貿易代理人的特權而成為耶穌會士中極不尋常的特殊人物，還由於這種世俗行為與傳教策略密切相關的緣故，他的行為舉止不僅在日本教區最具影響力，並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教會在日本的生存可能。單從天主教傳教的角度來看，陸若漢能夠擔此重任無疑有利於教會的利益和發展。

設身日本教會當時所處的特殊環境，陸若漢的這一不同尋常的新職務顯然會被視為意義重大而深遠。此舉表明，德川家康已經充分意識到耶穌會與葡萄牙商人的特殊關係，並試圖利用這種便利為自己謀取實際利益。而且，陸若漢能夠擔任日本統治者的貿易代理人，他在日本的合法存在必在情理之中。由此及彼，從某種程度上也意味着所有耶穌會士的留日似乎又開始具有合法性，有可能極大改善耶穌會在日本的政治困境。⁽²⁴⁾但從陸若漢個人的角度考慮，他擔任日本君主的私人貿易代理人與其傳教士

的身份極不相稱，很容易成為各方利益矛盾衝突的犧牲品，身陷難以解脫的困境，最終不得不離開讓他依戀的日本國。對此，傳教士梅斯基塔（Mesquita）在兩三年後給羅馬寫信時作了如下評述：

長崎作為國際商業城市開始繁榮起來，時常有從澳門滿載着中國絲綢的大船進入港口。在這樣一個時期，被指定為家康的貿易代理人，是一件非同尋常的榮耀之事，同時也負有重大的責任。在競爭過度混亂的市場中就任這一職位的人，在葡萄牙商人和日本官員利害關係的夾縫之中，肯定會受到雙方的嫉妒和憎恨。將一個耶穌會士置於這樣一個位置，從長遠來看可以說是百害而無一利。但是又不能拒絕這樣的指定，因為家康的命令還從未有入敢於拒絕，而且如果不接受這一重任，傳教活動就會馬上受到影響。⁽²⁵⁾

陸若漢作為德川家康的貿易代理人，其表面的榮光和內在的艱難已由這封信函表達得淋漓盡緻。

結語

在日葡生絲貿易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陸若漢被委以耶穌會司庫的重任，並進而被指定為德川家康的貿易代理人。照理說耶穌會中有能力的傳教士並不止他一個，是何原因使得他能夠得到如此的信任及殊榮，究其原因可以總結出四點：

其一，發展對外貿易並從中獲取利益是日本歷任統治者承襲不變的根本國策。豐臣秀吉、德川家康對於天主教教會的表面寬容，無非是希望借助教會的管道，通過對外貿易獲取現實的經濟利益。而重視、提拔陸若漢作為他們對外交涉的助手，也完全出自於他們世俗利益的需求。

其二，陸若漢出色的日本語能力早已在教會內外廣為人知，“通辭”幾乎成了他身份的象徵。⁽²⁶⁾陸若漢流利的口語、精明的辦事能力使得他在葡萄牙貿易中游刃有餘，很多貿易上的事情由他出面基本上可以順利解決。

其三，此時陸若漢已開始撰寫其名著《日本大文典》、《日本小文典》兩本語法書，僅此就足以掩

飾他早年沒受過正規教育的缺陷。陸若漢一直給接觸過他的人以聰明博學、精明能幹、誠實可靠、善於交際的好印象，無疑是擔任貿易代理的最佳人選。

其四，可說是決定性的原因：耶穌會巡視員范禮安的刻意栽培。儘管日本教會受葡萄牙直接管理，但范禮安很清楚日本教會的高層一直被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傳教士佔據。看到自己的同胞一直期待的（葡萄牙人能在教會管理中起到更大作用）願望一直沒實現，范禮安心裡很不是滋味，他希望在決定日本教會政策時，耶穌會的影響力能夠通過耶穌會士的人數充分體現出來，因此范禮安有意培養葡萄牙青年加入耶穌會，並創造機會讓他們參與各種拋頭露面的活動，以擴大其影響。正如庫帕所稱：

在 1601 年提陞為耶穌會士的七人中，除僅有的兩名西班牙人外，有一名是意大利人，四名是葡萄牙人。這一人數上的失衡在以後必將造成教士之間的衝突。⁽²⁷⁾

1591 年范禮安拜見豐臣秀吉時，陸若漢被提拔擔任范的私人翻譯隨同代表團赴京。如果當時沒有這個機會，也許他祇能作為一介傳教士默默無聞地度過普通的一生。陸若漢在與日本上流社會的高層人物深入交往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經驗和豐富知識。他猶如一顆閃爍的明星，在日本的京都、名古屋，尤其是在長崎這塊被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特許對外通商的惟一自由貿易港口，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註】

- (1) 海老澤有道：《日本キリスタン史》，頁 115-116，出版社：塙書房，1990 年版。
- (2) (3) (4) (9) (11) (12) (16) (27) 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原書房，1991 年 1 月版。頁 71；頁 76；頁 78；頁 200；頁 200；頁 190；頁 231。
- (5) (7) 五野井隆史著：《日本吉利支丹教史》，吉川弘文館，1990 年，頁 194，頁 195。
- (6) 絲割符制度：1604 年日本幕府制定的、江戶時代以中國產生絲為主的生絲進口制度，也稱白絲割符商法，詳稱“白絲割符商法”。此商法主要是針對江戶時代中國絲綢進口貿易所擬定的制度。——世山晴生等著：《日本史史料集》，頁 179，山川出版社，1994 年。
- (8) 地位低的官員祇能間接地通過近臣向德川家康報告。
- (10) 關於陸若漢出任這一教會外世俗職務的起因，同時期的教會文獻中有許多記錄。大致是因為 1601 年寺澤志摩沒有按照德川的要求，尋求陸若漢幫助，結果用高價購買了假

貨，事後寺澤將責任歸於陸若漢。真相大白後，家康貼出告示，對事件的真相做出澄清，並特別規定，此後與葡萄牙人交易時，必須有陸若漢在場。從此之後，陸若漢便名正言順地成為幕府將軍德川家康貿易代理人。——《十六、七世紀耶穌會日本報告集》，第一期第四卷，頁 13-15，同朋社，1991 年。

- (13) 法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附加手稿系列》155 至 156 卷。
- (14) 1612 年 2 月 25 日，《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 2，164 卷，Pacheco，“首張地圖”，18 頁也有關於這方面的敘述。
- (15) 這封信的底稿被留下，保存於羅馬耶穌會文書館內。
- (17) 1609 年，當時長崎的日本人稱此船為“馬德來德德烏斯（Madre de Deus）”。——前揭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第 13 章頁 247。
- (18) 由於前一年的 1608 年，葡萄牙的定期商船因故沒有來日本，因此，該商船運來了數量特別大的絲綢和生絲。陸若漢帶領代表團一行人最後一次去駿府，葡萄牙人按照慣例給德川家康及其身邊的官員們帶去了豐厚的禮品。但此次會見被安排在比葡萄牙船晚五日到達平戶的兩艘荷蘭船代表團拜見結束以後。由此勢頭已經表明葡萄牙壟斷同日本貿易的日子終於結束。德川家康清楚地知道，今後不必祇依靠葡萄牙的貿易，日本同葡萄牙以外的歐洲各國都可以開展自由的貿易往來。——基奧·羅德里格斯：《附加手稿系列》大英博物館 9860，129 至 135 卷。
- (19) 1608 年有馬晴信派遣的運輸船在澳門港過冬，其間，船上的日本船員和另一艘日本船上的水兵共有三、四十人攜帶槍械在澳門街上遊逛。當時居澳中國人因為倭寇的種種劣跡，一直將日本人視作不共戴天的敵人，故對此行徑十分憤慨，遂向澳門市政府提出抗議。葡萄牙官員們立刻向日本人提出：不要採取這樣招搖的行為，但日本船員和士兵根本不予理睬。11 月 30 日，由一些小事再次引起騷亂，進而發生了暴亂。安德列·佩索亞為維護澳門的正常秩序，調動了駐澳守備隊，在一所建築外築起街壘，將肆意滋事且不聽從勸告的四十多名日本人就地鎮壓。聽說此事後，澳門的耶穌會士們即刻趕到現場，經調解佩索亞同意釋放投降的五十名日本人，但四十多名日本人死於此次暴亂中的慘劇已經無法挽回。事後，日方在有關文件上簽名，聲明日本人承擔此次事件的全部責任，葡萄牙人沒有任何責任，事情總算平息下去了。——基奧·羅德里格斯，《附加手稿系列》大英博物館 9860，129 至 135 卷；這些珍貴的資料還出現在《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 31 的 252 至 260 卷裡。
- (20) 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 68，三省堂，1982 年版。
- (21) 帕奇奧，長崎，1610 年 3 月 14 日，《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 14，第 338 卷；這件事的許多珍貴信件記錄在 Schwade 的 *Destêro* 裡。
- (22) 基奧·羅德里格斯：《附加手稿系列》大英博物館 9860，129 至 135 卷。
- (23) 前揭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 69。
- (24) 這一新局面的重要標誌是，寺澤志摩失去了德川家康的寵愛，並被解除了長崎奉行的職務，由於新任奉行小笠原一庵並不長駐於此，當地的實際地方長官就是他的代官村山等安。加之作為其助手的四位町年寄都是天主教徒，教會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他們對長崎的實際控制權。——前揭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第 11 章頁 184。
- (25) 前揭梅斯基塔，長崎，1607 年 3 月 2 日，《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 14，284 卷。
- (26) 當時耶穌會內外多數人都稱他為“通辭羅德里格斯”。